

冯沅君是“五四”后涌现出的杰出女作家,以“淦女士”等笔名而广为人知。她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,还是一位一辈子都在教育育人的教师。作为作家和学者,她的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成果,历来受到重视,但相对而言,人们对于作为教师的她,关注得不够,论述也较少。

其实,教书育人是冯沅君一生的重心。她曾对学生说,“自从到大学教书后,就洗手不写小说了。因为教师面对的是学生,工作是神圣的,而人的生命有限,时间是个常数,容不得一心二用,一旦误人子弟,则过莫大焉。”

投身教育,死而后已

1917年,冯沅君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(1919年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),便留心教育。1921年5月4日,她在刊于《晨报》的《五四纪念杂感》一文中写道:“教育是大家所公认为国家根本的事业,应当特别扩充的。现在怎样?首都之下,累次陷入无教育的境地,虽说近来有些微复的希望,但是风雨飘摇的状况中,前途还是茫茫难测。外省呢?裁经费,罢课的事,也是时常听见的。”1922年5月15日至6月23日,冯沅君参加了由老师胡小石带队的“国内教育参观团”,到晋、鄂、苏、越参观访问。她对这次参观访问十分投入,细心观察,耐心访问,每天坚持写日记。她的日记后来发表在《晨报副刊》上。从日记中,可以看到她对教育十分关注,而且有自己的思考。在太原参观国民师范,“当我们从院中走出的时候,见有五六个人,担着泥、砖,由西往东走,看他们衣履之朴实,和手足肮脏的样子,只当成泥水匠了。后来有人告诉,方知是本校学生,他们这种能耐劳的精神,我真十二分的佩服。临走的时候,他们——校中办事人——还将该校学生由劳力而成的产品,送了我们许多,我真要愧煞了!”生产劳动实践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,冯沅君佩服赞赏这一点,说明她对教育有着相当深切的理解。在武昌参观模范小学,“走到礼堂附近,见挂有时事揭示牌,将每日的大事简单明了写在上面。这种东西我以为对于小学生很有益的,比那冷酷的无趣的格言牌子强得多。我素来的主张,小学教育,无论如何,总要使学生的感情尽量发展,这群带有真、善、美的小天使,要是硬以无情的教育去矫揉造作,使他失去本来的天真,简直是毁坏世间无上的艺术品,剥夺人们艺术的享乐,其罪真是不可赦啊!”这种重在发展小学生的情感,让学生身心愉快的发展,应当说是符合教育规律的。值得注意的是,此时的冯沅君还是一个只有22岁的大学生。

从师范学校毕业,冯沅君又到北京师范大学门读研究生,此后即投身于教育育人的事业。自1925年春开始,直至病逝,其间除了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之外,她一直坚守在高等院校的教学岗位上,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复旦大学、暨南大学、中国公学、安徽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天津女子师范学院、武汉大学、中山大学、东北大学任教。1947年到山东大学,直到1974年病逝。冯沅君到高等院校任教之后,由于时局动荡,运动频仍,还有个人家庭生活的一些不幸、病魔的折磨,她历经坎坷灾难,身心受到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重压。她痛苦,她艰难,但她从没有倒下,始终挺立恪守在教学岗位上。

1973年,她患癌症住院,最关注的还是教学,念念不忘的还是教学,还曾让丈夫陆侃如给她带教学参考书。在弥留之际,神情恍惚时,她还让护士扶着给学生讲课。她是在课堂教学的岗位上离开人间远行的。

舍得割爱,专心教学

冯沅君的情趣和爱好是多方面的。她是作家,发表的小说、诗词、散文,至今还为人所赞赏。她是学者,她的许多学术著作,有不少至今还摆在人们的案几上。她是翻译家,通英文、法文,有重要的译著传世。她到高等院校任教以后,虽然对上述的多方面仍有兴趣,继续努力,取得了不少成就,但她能做到割爱,始终把主要精力投用在教学和教书育人上。冯先生初登上大学讲坛时,已

帮助过一些进步学生。在东北大学任教时,有一位同学母亲有病,无钱医治,他们给他一笔钱,帮助母亲治病。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后,青岛解放前夕,李希凡旁听冯先生的课,中间遇到了经济困难,冯先生亲自给李希凡姐弟送去了四十银圆。1962年初,冯先生指导的研究生陈其相的祖母病逝,父亲又病重。冯先生知道后,马上拿出一百元,让她赶快寄回家。凡是接近冯先生的,都知道她生活十分简朴,舍不得多花一分钱。可是对同学,却慷慨大方,毫不吝惜。

冯先生乐意与学生交流,学生也喜欢接近她。吕家乡回忆:1952年,他和几位同学在毕业前夕去看望冯沅君。“她向我们谈经历,谈治学,谈写作。她告诉我们,她小时候缠过足,后来才放开,因此现在穿皮鞋还要塞一些棉絮,走路很不得劲儿。我这才想到,平时冯先生走路的的确有点‘扭扭扭扭’的样子。冯先生很有感慨地说:一个人要违抗社会风气,违抗潮流,是很难很难的。只有极少数杰出者才能做到。谈到写作,我们问她是不是还打算写小说?她叹了一口气,说:淦女士写小说简直是三代以前的事了,早就提不起笔了。辜负了鲁迅先生的期望,没有办法!”

约在1952年,1951级学生赵淮清和几个同学到冯沅君家看望老师。后来他回忆:“书斋幽雅雅静,到处飘溢着书香气。大家谈话无拘无束。她简单问了我们入学的经历,然后就兴之所至地谈文学,谈人生,谈山东的历史,妙语迭出。记得先生说过:‘你们入大学文科,文、史、哲都要打好基础,古典文学更是基础。古文学不好,白话文也是做不好的。’她主张大学几年起码要背诵上百篇精选出来的古文,古诗词更要多背,越多越好。”冯沅君先生讲得兴致盎然。说话间,一大盘黄澄澄的花生糖把我们“风卷残云”。先生脸上浮漾着慈祥,颤巍巍地,又从立柜里端出一盘,还没来得及落座,一位性格有点鲁莽的同学发话道:‘冯先生,您在法国留学时,您的脚会招来不少麻烦吧?’这种容易犯上又不相干的提问,很使我们为之着急。不料,冯先生却不以为忤,笑容灿烂,朗声答道:‘这也不难,学习孟丽君嘛,外面套双靴子就行了。’

冯先生虽然有博而深的学识,有许多有影响的著述,但她从不谈这些。她不哗众取宠,不露才扬己,对于世俗之名毫无兴趣。她和学生交谈,是真诚的,是自然的。这是经受过人文教育浸润而形成的真诚和自然。她与学生的交谈,洋溢着真善美的情趣,从各方面密切了师生关系。从教书育人的角度来看,这种交谈,如同雨露,能起到“润物细无声”的长期效应,学生受到了课堂上和书本上难以学到的教育。

古人说:“师者,人之模范也。”冯先生在她一生的教学生涯中,在做好言传的同时,特别重视身教,正己身,正己心,自然会感染学生。她凭借着向善、求真、趋美的人格魅力,如同甘霖雨露,滋润浇灌了学生的心灵。

冯先生指导的副博士研究生尚达翔回忆:1960年秋,“济南久雨成灾。星期二下午是冯先生给研究生上课的时间,哗哗的大雨就是停不下来。冯沅君住老校,上课却在新校,两地相距有四五里路,都是泥泞的庄稼地。花甲之年的老人,又是双‘解放脚’,如何走得过这么长的田间小道!学生们万分焦急,他们家里又没有电话。商量结果,派了3个男生骑自行车去老校,让冯先生改日再来上课。哪料,骑车的学生刚刚上路,她却撑着伞,背上挎了个书包蹒跚着过来了。女同学们赶紧把先生扶进屋,让她换上干燥的鞋子,埋怨她这样大的雨不该蹒跚水过来。她却若无其事地说:看天下着雨,我就提早上路了。还好,书包没淋湿。说完,她掀开备课本,拿出了一叠卡片,开始上课了。”一位曾经经过过的60岁老人,为了按时上课,冒着大雨,只身撑着伞,挎着书包,提前踏上四五里泥泞小路,蹒跚水跋涉,终于按时赶到课堂上课。严于律己,以身作则,胜于行教,深深地感动了学生,教育了学生。

身教重于言教。冯先生切实地做到了。(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)



从淦女士到冯先生

作为教师的冯沅君

张可礼



冯沅君(左)和丈夫陆侃如

学人小传

冯沅君(1900—1974),河南唐人。作家、学者。1922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,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文学门。1932年与丈夫陆侃如留学法国,1935年在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。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安徽大学、武汉大学、中山大学、东北大学、山东大学任教。曾任山东大学一级教授、副校长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卷菴》《春痕》《劫灰》,古典文学论著《中国诗史》《南戏拾遗》《古剧说汇》等。

麟回忆,1957年,冯先生给他们年级讲元曲时说:“不少同学的作业中还有错别字,对于中文系的同学是不应有的,希望大家勤查字典,我读了大半辈子的书,字典还常备案头。勤查字典是消灭错别字的不二法门,舍此别无捷径。”冯先生备课的认真,已经形成了习惯,习惯成自然,即使给几个人辅导,她也是认真准备。她指导的研究生陈其相回忆,有时她辅导研究生,只有两三个人,她也事先写好详细的提纲,一丝不苟。1962年,冯先生总结自己辅导研究生的体会时,讲到提纲的好处:“保证指导时既有点突出,又无遗漏。碰到应解答的问题多,而指导时间不够时,导师可以只讲重要的,次要的可将提纲交研究生带下去自己看……为此,我虽然觉得写提纲很费时间,可是总坚持下去。”她备课、写辅导提纲从来不惜时间,她说自己“指导两个钟头或三节课的时间,备课的时间大都是一天”。

除了备课,冯先生还一直重视编写教材,付出了大量心血。她先后根据教学的需要,编写了多种教材,其中有些正式出版了,如和陆侃如合著的《中国诗史》《中国文学史简编》,北京大学教授游国恩、中山大学教授王季思等合编的《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大纲》,和北京大学教授林庚共同主编的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,还有大量讲义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。她认为,教材要“力求符合学生的要求和水平”。她的教材和讲义都是针对不同对象编写的。她深知编写教材之困难,强调编写教材要有研究的基础。1952年,她曾对她的侄女北京大学教授冯锺芸说:“编教材很不容易,教材也能显示编者的思想认识,不能人云亦云。编教材也需要研究作为基础,不然,岂不误人子弟。”

冯先生编写教材,不论是讲义,还是教科书,始终贯穿其间的一种认真严谨、一丝不苟的精神。她和林庚共同主编的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,是为高等院校中文系诗歌选课程编写的教材,共选诗词曲一千首,选题曾三次征求专家意见,最后才确定下来。全书分上、下两编。上编自周至唐五代,由林庚主编。下编自宋代至五四,由冯先生主编。两位主编,除曾先后三次充分面商外,还经常交换情况和意见。冯先生主编的下编,参加者有关德栋、袁世硕、朱德才、郭延礼和赵昱元。冯先生作为主编,司其职,切实地尽到了主编的责任。她负责起草选目,审改初稿,组织讨论,并最后定稿。她还负责注解北宋全部、南宋大部分及金、元全部诗稿的工作。从今存的初稿和定稿中,可以看到很多冯先生修改的字迹。在编写过程中,她的一个助手,“对吴伟业两首诗的创作时期,依据常见的资料,做了个大约的推断,还在稿子上的一端贴了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时,她望了望窗外,校园里梨花盛开,洁白如雪,阵阵春风扬起片片梨花飞舞。她满怀深情地讲道:“诗人用春风比北风,用梨花比雪花。何

不能人云亦云,应当力求把问题搞清楚。”从这一事例,可以看到冯先生一贯的认真严谨和做主编的尽职尽责。

创新方法,灵活教学

在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方面,冯沅君在遵循传统的同时,特别注意探索和创新。

冯沅君一生讲过许多门课程,除了基础课外,还开设了几门选修课。她在讲授时,基于讲稿,但又从不照本宣科。研究文学史,作家作品属于人文学科,其中有一些属于基础知识,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着丰厚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情趣。教者和听者重在体悟、体验。冯先生讲文学史、作家作品,感情特别投入。1949级学生吕家乡回忆:“冯先生讲课则富有感情。有一次讲到王维的诗‘渭城朝雨浥轻尘……’她按照‘三叠’的方式朗诵了一遍,语调很快,像绕口令一样,引得同学们大笑。还有一次讲到明代散曲家王磐的《咏喇叭》,冯先生又朗诵又表演又赏析,我至今还记得她眉飞色舞的神态。”冯先生课堂教的情感投入,1949级学生赵淮青也铭记不忘:“有一次,她讲苏轼的词《念奴娇》,一字不落地背诵:‘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……’她的讲解,完全沉浸在作品中,洋溢着对千古名篇的挚爱。我还记得她在讲台上踱着步子,目光凝视前方的风度神态。这首词写得大气磅礴,她讲得也铿锵有力。先生虽外表纤弱,却传达出词中神魄飞扬的气势,把苏轼的感情发挥到极致。自然也难以忘。冯先生讲李商隐的词《声声慢》‘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……’时,又完全是另一种气氛。又是一次一字不落的朗诵,声音低沉,如泣如诉,充满似水柔情,字字钻进听者的耳膜,令人肃然动容。无意间,发现她的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光。沅君先生很推崇元代杂剧大家关汉卿,高度评价关汉卿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《窦娥冤》这部作品。当她朗诵《不伏老》中的‘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’时,声音高亢壮烈,富于感染力,也透露出她爱憎分明的性格。”优秀的文学作品,都是作者真挚感情的自然流露,每篇作品都是独特的,不同的作品情调也不同。冯先生讲授时,针对不同的作者作品,设身处地,满怀真挚的感情,讲出了真情别调。

冯先生讲课,常有顿悟,随时随地发挥。1953级学生郭同文回忆,1954年春,冯先生讲授岑参的诗歌,“此时,她虽然大病初愈,但讲起课来却精神焕发,口若悬河,声音铿锵有力。她绘声绘色地分析了岑参写边塞风光的《天山雪歌送萧判官归京》和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。当讲到‘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’时,她望了望窗外,校园里梨花盛开,洁白如雪,阵阵春风扬起片片梨花飞舞。她满怀深情地讲道:‘诗人用春风比北风,用梨花比雪花。何

等深切,何等独特!同时也表明了:寒冷的日子里也蕴含着明媚春意来临,显示了诗人在严寒中的乐观情怀!自古以来,写春风的诗歌甚多,而用春风比北风的诗,这却是首创。”

冯先生特别重视课后辅导这一环节。她同课堂教学一样,认真负责,而且有自己的探索和特点。重视个别辅导,也重视集体辅导。

冯先生个别辅导多是在她家中。她为了辅导有针对性,事先尽量汇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,认真准备,然后细心地讲解,即使有时身体不好,也按时辅导。约在1957年上半年,冯先生辅导中文系高年级学生论文。1955级学生吴长华回忆:“那时我们高年级要准备写学年论文,我选的题目是《论(牡丹亭)》,出乎意料的是冯沅君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。这‘渭城朝雨浥轻尘……’她按照‘三叠’的方式朗诵了一遍,语调很快,像绕口令一样,引得同学们大笑。还有一次讲到明代散曲家王磐的《咏喇叭》,冯先生又朗诵又表演又赏析,我至今还记得她眉飞色舞的神态。”冯先生课堂教的情感投入,1949级学生赵淮青也铭记不忘:“有一次,她讲苏轼的词《念奴娇》,一字不落地背诵:‘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……’她的讲解,完全沉浸在作品中,洋溢着对千古名篇的挚爱。我还记得她在讲台上踱着步子,目光凝视前方的风度神态。这首词写得大气磅礴,她讲得也铿锵有力。先生虽外表纤弱,却传达出词中神魄飞扬的气势,把苏轼的感情发挥到极致。自然也难以忘。冯先生讲李商隐的词《声声慢》‘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……’时,又完全是另一种气氛。又是一次一字不落的朗诵,声音低沉,如泣如诉,充满似水柔情,字字钻进听者的耳膜,令人肃然动容。无意间,发现她的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光。沅君先生很推崇元代杂剧大家关汉卿,高度评价关汉卿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《窦娥冤》这部作品。当她朗诵《不伏老》中的‘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’时,声音高亢壮烈,富于感染力,也透露出她爱憎分明的性格。”优秀的文学作品,都是作者真挚感情的自然流露,每篇作品都是独特的,不同的作品情调也不同。冯先生讲授时,针对不同的作者作品,设身处地,满怀真挚的感情,讲出了真情别调。

冯先生的集体辅导,常常是与“集体答疑”结合在一起的。《冯沅君传》第305页记载:约在1959年,她在教学中,还创造了一种“集体答疑”的教学方式。所谓集体答疑是“在个别辅导、个人阅读告一段落后,她让学生交上阅读札记,同时把疑难问题一起交上”,她在检查札记时,把学生提的问题梳理归纳后,给学生“集体答疑”。在她答疑完毕后,学生还可充分提问,然后师生展开讨论。教师答疑结束,她就反过来问“考”学生:让她阅读一段她布置过的古文;让你申讲一段文字,谈出你的评论意见;或向你提出一两个问题让你解答。答得不完善,她会请别人补充。”这种集体辅导、集体答疑,把指导阅读、写读书笔记、发现问题、提问、讨论、考问自然地连接起来,有严格要求,又有引导启发,既有针对性,又生动活跃,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。后来,“她的学生缅怀老师时,几乎异口同声地说:是冯先生的诗歌甚多,而用春风比北风的诗,这却是首创。”

冯先生乐意与学生交流,学生也喜欢接近她。吕家乡回忆:1952年,他和几位同学在毕业前夕去看望冯沅君。“她向我们谈经历,谈治学,谈写作。她告诉我们,她小时候缠过足,后来才放开,因此现在穿皮鞋还要塞一些棉絮,走路很不得劲儿。我这才想到,平时冯先生走路的的确有点‘扭扭扭扭’的样子。冯先生很有感慨地说:一个人要违抗社会风气,违抗潮流,是很难很难的。只有极少数杰出者才能做到。谈到写作,我们问她是不是还打算写小说?她叹了一口气,说:淦女士写小说简直是三代以前的事了,早就提不起笔了。辜负了鲁迅先生的期望,没有办法!”

教学相长,双向互动

1964年9月,冯沅君与她指导的研究生张忠纲交谈时说:“教学永远是相长的。”“‘教学相长’在有些老师听来是一句口头禅,其实是千真万确的,将来我们当了老师,就会体会到了。”冯先生在长达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,坚信这一真理,并且能切实践行。冯先生在教学中过程,特别是在备课、辅导和编写教材时,总是要翻阅、参考大量文献资料,但她从不照抄照搬,而是反复阅读、勤于思考,写成详细的讲稿。在这个过程中,常有新的发现。她不仅把这些新的发现充实到教学内容中,同时也诱发了新的研究兴趣,进而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,为学术界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。

1939年,冯先生在中山大学讲授元杂剧时,发现了三条有关王实甫生平的材料,当时她未敢贸然作断。此后她从孙楷第、王季思先生的论著中,又看到了新材料,并且邀请王先生询问陈寅恪先生有关见解的依据,这才产生了自己的一些推断,写成了一篇题为《王实甫生平探索》的论文。1956年秋冬之交,在山东大学一年一度科学报告会上,她以此为题作了学术报告,提出讨论。讨论后,冯先生继续修改,1957年刊于《文学研究》杂志。

在编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时,冯先生注意质疑,发现了不少新问题。如此书所选的清代吴伟业的作品《圆圆曲》与《楚两生行》,对这两篇作品的写作时间,冯先生没有沿袭以前的说法,而是阅读了许多有关的著述,仔细考证,从中找到了一些例证,认为《圆圆曲》作于顺治七年(1650)前后,《楚两生行》作于康熙初年。她把研究的成果纳入教材中,同时撰写了《吴伟业(圆圆曲)与(楚两生行)的作期——谈诗质疑之一》,刊于《文史》杂志。

关爱学生,亲近学生

冯沅君与学生相处,不讲所谓的师道尊严,而是提倡互尊、互爱、真诚、平等的师生关系。

在抗日战争时期,她同陆侃如先生支持进步学生,从经济上



山东大学校园里的陆侃如、冯沅君塑像。 资料图片